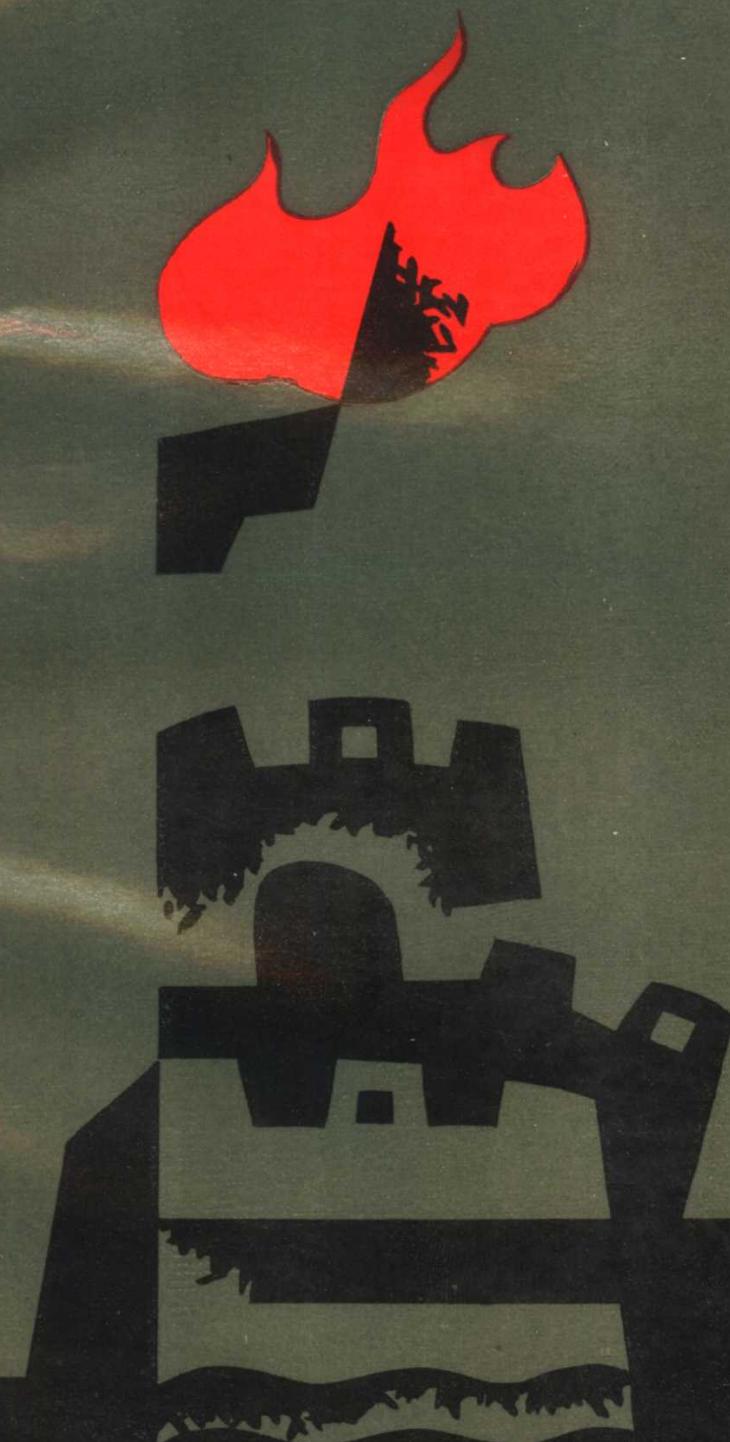


中国意识 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中国意识的危机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增订再版本)

[美] 林毓生著 穆善培译
苏国勋 崔之元校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邵立辰
技术设计 欣 宇

《传统与变革》丛书
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再版本）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美〕林毓生著 穆善培译
苏国勋 崔之元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毫米 32开本

14.575印张 209千字 412页

1988年1月第1版 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221-00139-1

B·12 定价：2.75元

总序

《传统与变革》丛书的第一批书稿总算
以现在这副模样同读者见面了。

有心的读者大概不会忘记，自一九八五年
夏秋间伊始，传统与变革问题成了思想理论界
的热门话题，大大小小的观念变革讨论会不计
其数，许多报刊也开辟了专栏，展开了讨论；
同时，更深层的文化反省和文化比较研究也成
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社会的现代化需要
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人需要有现代化的文化
和观念。然而，这话说说容易，真要深究起来
却不是简单的事。什么是现代化的文化呢？人

们当然不会简单到从时间序列的先后次序上去判断，谁也不敢断言说凡是新近出现的或者在现代生活中仍然通行的文化就是现代文化；同样，谁也不能断言说凡是在千百年前就扎了根的文化都在荡涤之列。问题恰恰在于：由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连续性，在现代人的文化性格中往往有可能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内容；而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也可能是鱼目和珍珠相混，金粒夹裹着泥沙。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近百年来，什么时候现代化的呼声高了，什么时候也就有这么些困惑伴随着人们：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观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传统？由此还酿成了至今尚未接近尾声的笔墨官司——一方面有人对我们说儒家文化预示着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有人对我们说在传统文化的地基上是盖不起现代化的大厦的。

在这片茂密的迷宫似的森林里，武断地感情用事是找不到出路的，全盘肯定式或全盘否定式无异于是用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训诫背得滚瓜烂熟，如果不做具体缜密的深入研究，同样于事无补。

有感于此，我们萌发了编这套丛书的冲动，主旨是想请一些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作一番描绘，对构成传统文化万里长城的砌块进行一次清点，看看哪些是坚固的青石，哪些是腐朽的白骨；对传统在现代人的心理、观念、风俗习惯上的积淀作一番透视，并站在时代与未来的角度进行预测和评价。

作为组织者，我们指望每本书都能在所论及的领域里回答五个层次的问题：(1)传统是什么；(2)传统的成因；(3)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及影响的方式；(4)传统的功与过和是与非；(5)传统在当代的转换趋势。当然这些指望是有弹性

的，不同的作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研究深度
畸轻畸重在所难免。

至于各书观点，并不代表编委会意见，编
委会在这里仅仅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孰是孰
非，由读者自己判断去。

如果说编委会对丛书的色彩起了某种作用
的话，那也主要是在写作风格上，我们强调了
可读性，强调了要舍弃那种晦涩、艰深、堆砌
概念的书斋气，强调了这些书稿不仅仅是（而
且主要不是）写给作者的同行看的，而是写给
那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文化思想建
设的非专业读者看的。

倘若这套丛书能够帮助“上下求索”的读
者挑明问题，或者为读者开拓视野、进一步思
索问题提供了某些启示，我们就算达到自己
的目的了。

传统与变革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北京

著者弁言

由于种种机缘，这部《中国意识的危机》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 1979)〕当初是用英文撰
成，在美国印行；但，基本上，我却是以一个
关怀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前途，认同中国文
化的知识分子的心情来讨论各项有关问题的。
今天拙著能够呈现在中文读者之前，笔者内心
甚感快慰，尚盼读者不吝指教。

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多年来承穆善培先生
和李泽厚先生尽心尽力，隆情高谊，至深铭
感。译稿我曾比较仔细地校订了前二章，其他
五章，由于时限的缘故，做的不够翔实，将来

如有再版的机会，希望能够补足这份未竟的工作。

林毓生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历史学系

增订再版前言

本书自去年十二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重视，数月之内初版五万册即已售完。我远在海外，但从责任编辑许医农女士、《传统与变革丛书》主编王润生先生、译者穆善培先生与友人李泽厚先生等的来信中也略知梗概，内心觉得甚为欣慰。这样欣慰的心情与英文原著印行后，我在接到第一本样书时复杂而落寞的心情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撰写本书英文原著时，从开始阅读五四时期的一切有关材料，心中漫无头绪、不知如何做起，到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思想史的观点用以提出分析思想史的问题，到心中在反复推敲以后渐能提出一套自己信得过的系统性分析与

论旨，到英文书稿得以撰成，前后整整花了十年的岁月。那是1964到1974年的事情。当时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极少有直接与中国接触的机会，祖国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煎熬之下。可是，在海外许多华裔知识分子与学者当中，却从“保钓运动”发展出来了一个虚脱的、自我陶醉的、不负知识与道德责任的，对“文化大革命”及其领导人物的崇拜运动。

因此，我希望能够贯通热烈与冷静之间的心情下，对以五四激烈反传统为主轴的中国现代思想进行理性分析的工作，与当时的外在环境和时代潮流都显得很不调和。正如我在“著者弁言”中所说，本书当初虽是用英文撰成，实际上却是为中国而写。但在我看到英文样书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却是：如我的分析与论旨确有新的、系统化的可取之处的话，真不知何年何月祖国的同胞能够接触到它们，并借以减少再走冤枉路的可能。

我们必须认清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绝不应是黑白二分——要现代化就非全盘地推翻传统不可——的关系。我们可以并应该对一切传统中恶毒的、陈腐的成分加以严厉的排斥，但这一

反传统思想却无端是全盘性的。怀海德 (A.N. Whitehead) 曾说：“生命有要求原创的冲动，但社会与文化必须稳定到能够使追求原创的冒险得到滋养；如此，这种冒险才能开花结果而不至于变成没有导向的混乱。”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博兰尼 (Midacl Polanyi) 与海耶克 (F.A. Hayek) ——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识见。然而，二十世纪中国思潮的主流却偏偏是：一方面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这是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发展的最大矛盾、最大困扰之一。根据本书的分析，五四式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全盘西化论——实际上正是未能从儒家传统一元论、有机观的“思想模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结果。那是受传统“思想模式”的影响所产生的形式主义的谬误。我们知道：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旧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如要建立这样一个有生机的传统，我们必须根据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情

怀，先从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然后尽量使自己获取灵活、精微、多元而辩证的思想方式与分析方法。这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最大课题之一。

这次再版，我得特别感谢苏国勋与崔之元两先生所做的重校工作（苏先生出力尤多）。许医农女士与王润生先生对本书的编审与赞助也是我衷心感谢的。由于出版社要赶着发排，所以我未能对苏、崔两位的重校再进行审订。不过，我想这次重校一定会使本书更接近英文原著。原著中的几处删节，也因中美两地连络不易，未能完全复原。将来如有三版的机会，当尽力争取时间亲自校订，并尽量将删节之处复原。本书的内容与表达方式，因个人能力有限，当然会有许多不足之处，虽然我已竭尽所能无法把其中的论式与分析写得更为简要。我诚恳地希望读者惠予批评与指正。

本书英文原著出版以后，历年来我曾写过一些中文文章，并曾结集出版，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中文世界中流通。这些文章包括我对本书进一步的意见及其所提出的问题的初步答案。北京三联书店计划选集其中一部分，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题重新印行。我现在选

丁两篇(一、《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二、《中国人文的重建》)放在后面，作为本书的附录。

林毓生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于飞越太平洋，前往祖国的航机上

序

〔美〕本杰明·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19世纪时，西方通常视中国为僵滞的传统主义的典型。到了20世纪中期，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已变成革命之域——一个已经获致与过去所有文化秩序全盘而彻底决裂的社会。当我们反省何以中国独为恒常不变的传统的象征，我们会意识到，这种态度乃系于如此的认知：中国过去能够完整无缺地维持一个使社

会、文化与政治完全得到整合的秩序，而这个整合秩序又是由涵括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于一己的阶级所领导的。传统的赓续绵延显然是这个社会、文化与政治完全得到整合的秩序无所不涵的整体性底功能所促成的。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我们清楚地知道，它的领袖们的意识形态是来自外国，而此种意识形态显明地要求要与过去“封建”社会和文化产生彻底革命性的决裂。

必须提到的是，治中国近代与现代思想史的学者们早在共产党胜利之前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以不同程度转变为主张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如林毓生教授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conoclasm)。根本上，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包涵两项预设(Assumptions)：其一，过去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必须当做一项“整体”看待；其二，此一秩序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拒斥。如同林教授一样，大多数治20世纪思想史的学者的注意力都被“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五四运动中占有的强大势力所触动。他们也清楚地看到，自五四运动以来，数十年中国思想界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然以不同程度抱持此种反

传统的态度。因此，他们通常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看做五四运动的产物。

然而，十分清楚地，无论20世纪中国反传统的冲动是多么真实而有力，也无论过去的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实际整合是多么真实，把这个与整体性传统整个决裂的整齐而辩证的图象，当做中国现代史的全面描述，是很不正确的。近几十年来，修正这种全盘与过去决裂的刻板的形象的著作不在少数，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目前正有成果丰硕的探究。现代中国的各个生活层面与过去文化之间不自觉的或未经明白承认的连续性，也正在被彻底地加以考察。

在这种修正观点——多半是合理的——之前，必须指出，林教授绝不是想在这本推论缜密而谨严的著作中再度肯定当初的那个形象。他绝未宣称，传统中国在事实上是由不可分割之部分所构成的无所置疑的整体。他也绝对没有说，中共在实际上与传统中国文化所有好的或坏的方面已经全盘决裂。实际上，他的分析核心乃是，深植于一些中国文化倾向的某些态度，深切地塑造了反传统主义者本身的观点。

他所要肯定的是——无论传统中国文化中